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

白宫岁月(下)

缔造和平

(二)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

——白宫岁月(下)

缔造和平

(1956—1961年)

二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

静海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十六章

主要是党争

有适当的限制，才有自由。

——丹尼尔·韦伯斯特

在1958和1959年，随着1960年的选举日渐逼近，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剧烈。四个主要回合是，1958年的国会选举，1959年的预算之战，就克莱尔·布思·卢斯的提名而爆发的一场短暂而混乱的小接触，以及拒绝确认刘易斯·斯特劳斯为商务部长的可耻行径。

在第一回合中，共和党人遭到了影响深远的惨败。1958年11月，投票统计结果，民主党人在参众两院以近乎二比一的多数胜过共和党人。在州长的竞选中，二十六个民主党人获胜，使他们的全国州长总数达到三十五，而共和党人则只有十四。随着这些结果，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我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面临连续三届国会都是反对党在两院占多数的总统。

在选举那天晚上，传来了一些零星的、但是给人印象很深的好消息。共和党人马克·哈特菲尔德，一位年轻的政治学教授，在俄勒冈州击败了他的民主党州长对手。克里斯托弗·德尔·塞斯托成为通常是在民主党人控制下的罗得岛的共和党州长。休·斯科特众议员挫败了乔治·利德州长，取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参院席位。在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击败了他的民主党对

手，同时，共和党人保罗·范宁赢得了州长职位。在纽约州，纳尔逊·洛克菲勒以五十多万票击败了在职州长艾夫里尔·哈里曼，同时，共和党人众议员肯尼思·B·基廷进入了参院。

然而，全面的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而鉴于我们仅仅在两年前还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压倒的多数，所以尤其使我感到泄气。

我们在参院的一个损失特别使我伤心，那就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W·布里克。尽管我们就1953—1954年的布里克修正案（试图对总统缔结条约的权力加以限制）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但是我尊敬这位参议员。他和我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一致，政府常常由于他的忠告和支持而得益。

尽管民意测验已直率地作了预告，但是诺兰参议员在加利福尼亚州长竞选中的失败仍然是另一条令人不快的消息。因为我想加强州一级和联邦一级的开明政府，所以我希望诺兰赢得他争取州长职位的战斗。预选时共和党在该州的内部斗争部分地说明了这一失败的原因，但是，使该州脱离传统的共和党领导的根本原因却不清楚，很难说明白。

在竞选运动中使我厌烦的是，某些政治作家力图证明共和党人是一个有深刻分歧的党。他们经常引用的就是诺兰参议员和我之间的分歧。还举出了一个数字。但是，早在我1957年8月30日写给共和党全国主席米德·奥尔康的信中，我就说过：“诺兰参议员是头四、五个投票赞成我所提出的各项政策的共和党参议员之一。除了一两次例外，在五年期间，他只是在一些细节性和技术性问题上投了反对票。有时候，我们在对外事务的适用政策上有分歧，但是在各项重要的政府计划上，他总是带头争取得到批准。”

说他和我是政治光谱中对立的两极，这是过分夸大的攻击。

1956年，在选举日的晚上，我在一次电视谈话中，偶然用了“现代共和党主义”这个词汇——意思仅仅是指共和党原则对今天

的问题的应用。某些人抓住这样一句随便说说的话，把它看做党的政治思想存在分歧的迹象。我认为，一个现代共和党人是一个支持 1956 年竞选纲领的人——除了一些不满分子外，这个定义将肯定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但是我告诉奥尔康主席，如果必要，我很乐于放弃这一说法，而代之以同一意思的其他说法，因为我要说的无非是强调共和党思想的主流是受严格的常识指导的。我感兴趣的不是空话、预言和权威性评论，而是一个人的投票行动。

尽管我们党内重大问题上都是基本一致的——同把民主党一分为二的鸿沟相比，我们只是有一条裂缝罢了——但是我们失败了。为什么？

单一的原因解释不了这一失败。

毫无疑问，一个原因是那一年的经济衰退。虽然失业人数从 7 月份以来已从五百二十万的高峰降下来，但到 10 月中旬，仍为四百七十万，而到 11 月中旬，则为四百三十万。在在职的共和党人丧失席位的四十九个国会选区中，有三十八个选区受到了严重的失业的影响。

另一个有关的原因是，中西部对农业法愈来愈感到不满。六年来，政府曾迫切地想修改这些法律，但是两党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是如此相左，以致使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在农业产值高于所有其他地区的二十个国会选区中，民主党人在 1952 年仅仅选上三个众议员，1954 年只有四个，1956 年有八个；但是在 1958 年，他们选上了十三个。

还有一个原因是某些州的一系列“就业权利”法案——旨在取消劳工合同中义务工会会籍的条款。塔夫脱-哈特莱法第十四条第二项授权各州在这一问题上便宜行事，我认为在联邦法律中作这一规定是明智的和适当的。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我一直坚持这一观点，既反对象美国劳联—产联所主张的那样对它进行修改，也

反对象诺兰参议员以及其他人所鼓吹的，要求联邦立法禁止义务工会会籍。1958年，堪萨斯、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爱达荷、俄亥俄和华盛顿等州的公民们曾就赞成或反对制定这样的州法律举行投票。劳工组织的领袖们拚命反对这些法律。只有一个州，即堪萨斯州的投票者们表示赞同立法。在其他五个州，“就业权利”法案的公民投票均告惨败。而赞成这些法律的三个主要共和党人——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参议员、俄亥俄州的布里克参议员和C·威廉·奥尼尔州长，也得到了同样的下场。

我们的失败的另一个因素是“COPE”，即美国劳联—产联的政治教育委员会，它的主要教育方针似乎是为选举民主党人作宣传。据劳工组织称，该委员会为1958年的选举花了将近两百万美元，其中百分之四十二用于州和地方劳工委员会，百分之五十五直接用于民主党候选人，而用于共和党候选人的则不到百分之一。共和党没有联合组织来与这种一边倒的劳工支持相抗衡。

在竞选运动中，尼克松副总统象在1954年一样，从东海岸跑到西海岸，试图鼓励共和党人行动起来。作为一个好斗的竞选者，他对反对党的指责是没有不予还击的。

例如，在10月初，民主党顾问委员会宣布它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说：“无领导的优柔寡断的六年已使我们濒于脱离我们盟国的边缘，使我们面临着必须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单独进行核战争的危险。”

“很简单，”副总统反驳道，“艾奇逊对外政策的结果是战争，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对外政策的结果是和平。”

我一向憎恶和反对把对外政策当作政治足球。但是对方开了这个头。我坚信，我们的行动使我们避免了战争，并阻止了使我们在1949年丢失了中国的势不可挡的、人海战术的共产党进军。1953年当我们的政府接手时，他们正威胁着印度支那、伊朗、危地

马拉和朝鲜，我们有效地还击了这些威胁。我主张把事情摊开来谈，我写信给迪克说，真相是我们能使用的最有效武器。

虽然报纸大事登载这类争吵，但是共和党人中间仍然保持着一种神秘的冷漠。这种冷漠看来部分地是由于亚当斯事件^①而造成的。9月4日，我写信给克利福德·罗伯茨说，

你的报道使我最感不安的一点是，你似乎认为“绝望”情绪已成为一种可在国内普遍觉察到的共和党态度。这使我很泄气。鉴于国会是那样一种党派成分，政府这六年来的纪录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诚然有一个人犯了错误，但是从没有人告发他是个坏蛋啊。然而，几乎仅仅因为这个事件，仿佛便造成了所谓的“绝望”。

在前届民主党政府中，非常高级的官员们曾因各种过错而被告发和定罪。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民主党人并没有因为这些事件而同样受到绝望情绪的折磨呢？

但是对所谓的共和党人的冷漠态度所提出的种种成因，没有一个是真正令人信服的。无论是在当时，或是后来，我都不能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或甚至是一个对我来说能讲得通的托辞。

在竞选运动开始以前，我就决心解决一个驳回的问题：我坚信，国会里那些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党人的那些造成赤字、引起通货膨胀、不负责任的花钱提案，必须处处予以反对。

在1960财政年度，政府将不得不用其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支付它的债务利息。这就相当于我们在自然资源方面投资的五倍。在二十世纪，已有三十四個赤字联邦预算，我认为，其中有一些是不必要的；这些赤字造成了我们这一辈子美元的急剧贬值。所以我是反对超过国家正当需要的联邦开支的。

国会的抽屉里塞满了各种在我看来是既浪费又无用的法案。

^① 指本书第十三章所叙述的谢尔曼·亚当斯因受贿而去职的事件。——译者

仅仅是民主党众议员们在1958年会期中所提出的三个为期五年的法案，就要从联邦国库支取一千五百亿美元^①。为筹集这么多的钱，政府就得要么债台高筑，要么向当时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小孩增收将近一千美元的税款。

那种不断要求增加花费的轻率风气以及我们方面对制止这一风气的明显无能使我感到吃惊。

在否决一个法案中某些具体条款的权力遭到拒绝后，我在1958年夏天怀着一种失望的心情写信给乔治·汉弗莱说，鉴于某些法案中大部分是好的，我就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签署这些“我个人认为是把不正当的浪费强加给国库”的法案。我特别引述了一个要求提高文官薪给的法案和一个要求调整邮资但同时也包括增加人员工薪的邮政法案。我对乔治说，我希望我能“多少更有口才一些”，以便尽力使国会了解“不正当花费的危险”。我认为，某些国会议员明确表示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目标，而另一些议员则试图在政治上耍滑，竭力推荐一些荒谬的花钱法案，它们无疑会遭到总统的否决，但是它们将给他们留下一份投票纪录，足以在下次选举中抚慰压力集团。

为了增加他们自己再次当选的希望，两党的不少立法者似乎不仅准备抵押未来的十年，而且准备抵押下一个世纪。还有一些立法者更是厚颜无耻，他们不仅靠自己的花钱计划，而且还莫名其妙地靠所谓“总统的支持”来竞选。

幸而在国会里处于控制地位的人们还有足够的常识来阻止那些最荒谬绝伦的法案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来。无论如何，我决心在

^① 众议员乔治·麦戈文的农业法案需要花费三百六十五亿美元；众议员托马斯·艾伯内西的把豁免所得税的限额提高一千美元的提案将会造成五百亿美元的损失，而众议员赖特·帕特曼的给每个六十五岁以上的人以生活津贴的提案则需要六百六十亿美元。

我的体力允许的范围内发动一场最强烈的反对挥霍的运动。我争辩说，除非选到华盛顿来的一届国会能决心反对这种倾向，否则联邦政府将无力保护纳税人的美元的购买力。

1957年秋天，阿瑟·伯恩斯博士在福德姆大学作了一系列讲演，后来他出版了一本书：《没有通货膨胀的繁荣》。他送了我一本；这些讲演注意的重点不是“跑马式”的通货膨胀的危险（过去有过这种事，例如，它曾使德国雇主不得不给他们的雇员一天支付三次工资，因为德国通货几乎每小时都在贬值），而是“爬虫式”的通货膨胀的潜在危险。他在这本书里以及随后的通信里指出，自从1933年以来，美国的物价在企业扩张期间曾有可观的上升，而在企业紧缩期间却根本没有下降，或仅仅下降一点点。在1929至1933年这个企业盛衰的周期中，消费价格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与此正相反的是，在1953至1954年的衰退中，消费价格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三，在1957至1958年，则上涨了百分之二点六。我们甚至在“通货收缩”时期显然也经历了某种通货膨胀。

据伯恩斯博士解释，象食物、衣服、工业品和劳务等总费用的缓慢上升有下列几种并非一定都坏的原因：经常力求制止经济衰退和延长经济扩展的政府政策；私人债务的增加（例如1955至1956年，个人和公司的债务增加了九百一十亿美元，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则只增加了九十亿美元）；和工资的增加（甚至在衰退时期）。

如果在经济紧缩时期，物价和工资都很高或越来越高，那么在其他时期稳定的前景是很暗淡的。

有人问，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为什么不让物价永远缓慢地上涨呢？对这样的问题，伯恩斯博士作了某些简单的、我认为是正确的回答：

（1）通货膨胀可能失去控制；开始是缓慢的，最后可能是

飞涨。

(2)通货膨胀危害人民。物价一年平均上涨仅百分之一，在二十五年内一美元就将贬值五分之一以上。伯恩斯博士得出结论说，通货膨胀“势必使一代人中千百万人的计划和希望遭受打击”。

阿瑟·伯恩斯谈到了制止物价悄悄上涨的种种措施，但是在他所推荐的主要措施中，他坚持认为“政府必须引导经济团体实行节制”。他的意思不仅是指平衡的预算而已。他指出，巨大的联邦支出本身就可能引起通货膨胀，那怕税收完全足够补偿。他列举了下列成因：政府官员作为买主往往不如私人买主精明；政府价格常常是用“成本外加”法^①来计算的；政府合同受特殊劳工条款的支配；政府的开支，尤其是防务开支，不一定能象同样数额的私人开支那样，大大有助于改进企业能力和生产力；当联邦开支和联邦税收增加时，私人开支不一定对等地下降。结果就是总开支的增加，这也就是通货膨胀。

所以他争辩说，当经济达到饱和，联邦预算平衡时，政府应当力求以削减开支、延缓那些尽管想望已久但不急需的计划来增加盈余。因为在充分就业的时期，无论是联邦或私人开支的增加都容易引起物价的上升。

但是，伯恩斯博士认为，“政府还没有作好准备，象制止衰退那样果断地制止通货膨胀。……在经济政策的天平上加上这种砝码，无论多么轻微，在当前的舆论状况下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这些看法是否被广泛地理解，但我是赞同的，在1958年的竞选中，我发起一个运动，试图改变舆论。我认为，所有共和党人都应当为这个将来可能被当作一项历史性成就而加以铭记的事情作出努力。我将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即使我必须单枪匹马地去

^① “成本外加”法的意思是，在实际成本外，再加上一笔固定的手续费或按成本外加一定百分比的款项作为利润。——译者

干。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在9月29日写信给阿瑟·伯恩斯说，似乎不是太多的共和党人表示同意。

10月20日，在洛杉矶，我发表了被某些作家称之为我生平最直率的竞选演说的讲话。我说，民主党“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名称相同的政党。他们仅仅是每两年联合起来一次，以便竞选议员。

“一头是几星期前在南方预选会上对今年的竞选运动作了基本安排的那一派，另一头是受政治上的过激分子支配的更强有力的一派。……”这就是那些向美国的稳健的、向前看的政府财政政策提出真正挑战的人。

“大多数美国人都反对轻率的、公开的浪费。在这方面，国会过激分子的纪录是恶迹昭彰，记忆犹新，所以无需作什么解释……

“今年在国会……政府法案一个接着一个地遭到砍削或迅速夭折……

“……仅仅是由于共和党人在国会的坚决抵制和我的否决才堵塞了五十亿美元以上的这种浪费。请你们想一想，联邦的这数十亿都是你们的钱——你们自己的钱。或者是通过高额税收来自你们的支付支票，或是通货膨胀掏了你们的腰包。”

我争辩说，这次竞选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在不负责任的政府和向前看的开明的政府之间，在压制人民的联邦政府和亲近人民的政府之间，在一事无成、窒碍难行的政府和能履行其对美国的诺言的有效率的政府之间，作出决定性的选择。

“如果你们赞成一个可信赖的、进步的政府，”我结束讲话时说，“那么很明显，你们应当为共和党人说话，替共和党人出力，并在11月4日投共和党人的票。”

结果是白费力气。

11月4日晚上，传来了坏消息。第二天早晨，在我的记者招

待会上，记者们就我在洛杉矶的演说中谈到选民有选择自由的那些段落向我提问。

一开始，一个友好的记者以巧妙的措辞说，我的竞选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告诉公众民主党人是旨在蛊惑人心的骗子教义的左派传教徒。

我不得不强调指出，我从来没有这样指责过整个民主党，而是指责它的“挥霍者那一派”，并且在这方面我也显然没有大做文章。

至于其余的提问，我没有加以回避。我说，选民们显然已经投了“……我将把他们列为挥霍者的人的票……而且我保证，在下一个两年里，望上帝保佑，我将尽我所能地拚命为此而战斗”。

那天，我私下告诉白宫办公厅说，选民似乎想把所有的责任扔给联邦政府。他们选出了一个共和党的票数连行使否决权也不够的国会。但我们是打输了一次战役，而不是一场战争^①。

关于我，我没有找替罪羊。也许我的过错比谁都不少。但至少是这样的人太多了（包括某些共和党人在内）：他们尽管高声宣告，他们坚决支持以财政上的稳健和开明为号召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被联邦开支用于他们有关地区的前景所诱惑，致使他们遗憾地不能全心全意投入竞选运动。

当《芝加哥论坛报》的拉里·伯德问我，我认为是什么因素使共和党人遭到失败时，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要说，我同意尼克松副总统和共和党主席米德·奥尔康早先所说的：“如果共和党人今天早晨，今天这一天，不开始为下一次选举战斗，那么，他们的情况将不妙。”

* * *

在共和党内部显然是有许多事情要做的。正如米德·奥尔康

^① 我接到的许多慰问信中，有麦克米伦首相于11月7日寄来的一封亲切的私信（见附录二十）。

所说的，在许多人看来，我们的党“象一头冬眠的大象，在选举的时候它在一阵响亮的喇叭声中醒来，然后就躺下去睡觉直到下次竞选运动到来”。这话说得很有趣。我要求奥尔康最多不超过两周之后便来看我，以便讨论他为寻求对政府计划的统一和有效的支持而作的努力。

为了给1958年的失败寻找一个替死鬼，有几个人劝我撵走奥尔康。我拒绝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出色的主席。他的智慧、活力、想象力和献身精神都是堪为楷模的。实际上，在竞选运动期间，他工作得非常辛苦，有时候我都担心他可能搞垮身体。我继续全力支持他，而当他最后在1959年4月1日辞职时，我从心底里感到惋惜。

1958年12月6日，我为存档写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叙述复兴共和党的种种措施。这是以迪克·尼克松和我的谈话为基础写成的，我相信他在1960年的全国选举中将是共和党的旗手。

我们在一系列事情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其中包括研究和改组组织，筹集和利用款项，揭发我们最近的竞选运动中的错误并加以改正。结果，我们的想法并没有按我们原来的设想得到实现，而是作了某些改进。

我们建立了一个以芝加哥的查尔斯·珀西为主席的共和党计划和进步委员会，来拟订共和党在国内外政策的每一个领域中的长远政治目标。这个组织从1959年春天到夏天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在秋天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报告。

我们也竭力鼓励1952年和1956年的“支持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班子公民组织”的成员们，为改进和加强正规的共和党而工作。有一天，我口授了一封信稿，概括地谈到了我们可望从这一特殊努力中得到的某些结果。

我坚决相信，两党制对于保全我国的民主进程说来是至关重要的，而

我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希望看到那个制度继续下去，从这个前提出发，我建议下列活动方针……

首先，我希望你们现在这个组织，在下次竞选前的两年里，不仅要存在下去，而且还要加强。我对全国选举……的“热闹劲儿”深有体会，但是在一年中的每一天，在每一条地方政治战线上，都有着扎实而重大的工作需要完成。

我号召“公民组织”继续支持我在1952年和1956年两次竞选运动中所实行的那些原则，与此同时，还要物色到可能的候选人，他们不仅信奉这些原则，而且是朝气蓬勃的、富于献身精神的和有口才的领袖：

我建议“公民组织”在自己人中间做工作，并与正规的共和党组织共同努力，去罗致那些具有切实的和进步的政治哲学的、有吸引力的、年青的候选人，并在地方上为他们树立名声。应当亲近这样的人，如有可能，则吸收他们到竞选机关中来为公众服务，尽管他们不一定在竞选活动中居于首要地位。如有条件，应当用电视摄影机把他们介绍给公众，保证他们广为人知……美国人民现在愈来愈倾向于根据他们自己的估计来选举担任公职的人，这当然对头……

尽管人们的兴趣无疑容易集中在个人攻击上，但我想，暂时先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争端上则会收效更大……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坚实的——和广泛的——基层根据地是建立我们所需要的那种进步组织的必由之路。我们都已懂得，在一次地方性或全国性竞选运动中搞党内分歧之类的福气是没有我们的份儿的……

其次，我召来珀森斯将军，要他打电话给政府(在非政治部门的除外)中每一个总统任命的人，询问他们在下一个两年当中，能在其各自的地理或业务范围内为共和党出什么力。我要求每一个被任命的人在诸如劳工团体中间，在管理员、教员、实业家和专业人员中间担负起专门的责任。

政府的主要的和直接的战场是国会山。11月19日早上，众

院少数党领袖、马萨诸塞州的小约瑟夫·W·马丁来吃早餐。我们讨论了恢复共和党的组织的活力和作用，和选拔富于天赋领导能力的候选人进入我们的候选人名单的必要性。但是当我建议我们应当有几个比较年轻的共和党议员定期地到白宫来参加领导人会议时，我遭到了反对。

在1954年和1956年，当共和党两次失去对众院的控制时，查尔斯·哈勒克众议员都曾到白宫来告诉我，他打算反对马丁担任少数党领袖。他要我支持他的这一企图，但是我两次都拒绝了；他服从了我的决定。但是在1958年的失败之后，哈勒克再次来找我。

“是时候了，”他说，“我再不能在马丁的有名无实的领导下工作了。以前我耽误了两次，但是这一回我决定把他拉下马。我拉得到足够的票数。”

“查利，”我回答说，“你知道，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来团结众院的共和党议员，力图使他们通力合作。但是现在，眼看着共和党人在全国各地都萎靡不振，我坦白对你说，尽管我不想影响任何国会议员的投票，但是我将不再妨碍你。”

1959年1月6日，哈勒克在一次共和党干部会议上，用秘密投票方式，以七十四票对七十票击败了马丁。马丁指控说，“尼克松的人积极反对他”，他断言说白宫班子的若干成员曾插手帮助哈勒克。后一点他弄错了。遵照我的命令，我的助手们都没有“干预”。

我请马丁作为每周领导人会议的成员之一留下来，但是他拒绝了。在参院方面，由于诺兰参议员的逝世，共和党人也必须选一个新领袖。

诺兰参议员是一个国会特权的热心拥护者。“你一定不希望美国参议院仅仅变成一个橡皮图章吧，”他在领导人会议上一再这

么说。他往往平白无故地觉得联络官（我们全靠他们来维持白宫和共和党国会领袖们之间的协调）怠慢了他，便禁不住大发脾气。自然啰，当整个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同心协力地以高速度、有时候还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时，要保证合作的齿轮不掉进一粒砂子，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事。尽管诺兰参议员在这种事情上有点神经过敏，他毕竟还是参院的一位有实力的党的领袖。

1958年的选举过后，国会大厦里谣传最近当选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可能想谋取少数党领袖的地位。在那些来向我通风报信的人中间，有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参议员，他对于行将同他共事的共和党领袖的人选，自然是感兴趣的。我对他无可奉告，但是当共和党参院干部会议在1月7日开会时，两个主要候选人却是伊利诺斯州参议员埃弗雷特·麦金莱·德克森和肯塔基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德克森以二十票对十四票击败了库珀。库珀的支持者之一、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托马斯·库切尔当选为少数党国会领袖。德克森见多识广，平易近人，是一个忠心耿耿的陆军中尉。如果他能得到多数的支持，他也许能创造出奇迹来的。

他也罢，众院的查利·哈勒克也罢，都必须设法把为数很少的共和党议员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排成战斗队形，为支持政府的法案而不是个别立法者自己心爱的计划鼓噪呐喊，并且首先要守住阵脚，反对1959年立法会议上的中心危险——来自占压倒多数的民主党人的挥霍无度的提案。

* * *

“形形色色的荒唐提案都将以国家安全和‘穷人’的名义提出，”我在1月13日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上对立法领袖们说道，“我们必须说服美国人，节俭不是一个坏字眼。”

战斗是围绕着1960财政年度的预算展开的。我在1959年1月向国会提出了这个预算——一个七百七十亿美元的收支平衡的

预算。顾问们警告我不要在一年里就立即从一个估计赤字为一百二十九亿美元的衰退期预算转变为一个平衡的预算。有些人则认为我们不能把支出削减到八百亿美元以下。我参考了其他意见的结果，还是送出了一个平衡的预算^①。我打算让国会知道，如果它大幅度地增加预算，我将予以否决，如果否决遭到驳回，我将提出以增税来弥补开支的增加部分，而如果必要的话，我将为此日的召集一次特别会议。

虽然在当时的形势下难免要作出很大的妥协，但我决心要运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阻止我国货币的贬值。“这将是我們空前激烈的战斗之一，”一天上午我在办公室对一批人说。我知道我们没有大获全胜的希望，但挥霍者们也休想全胜。

在编造预算时，巨额的军事要求，象通常一样，使我们伤足脑筋。各军种的预算中的每一个大项目，非得对“为什么”这个问题作出使我满意的答复后才能获准列入。经过一系列棘手的会议之后，我们把国防部的军事拨款预算降到了四百零八亿美元。

在卫生、教育和福利方面，我坚持主张多花钱并不一定加快进步。阻止我国货币的贬值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目标，因为美元的购买力一旦失去保证，那些有朝一日将依靠养老金、保险单和公债形式的储蓄过活的人便难过日子了。再者，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避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能破坏刺激经济的因素。

为求削减农业方面的开支，我写信给本森部长，建议他考虑规定一个农场收入的最高限额。我问他，“我们能否想些办法，避免在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小农的计划掩护下，用联邦补贴来制造百万

^① 安德森财政部长尤其主张预算平衡，认为这是加强外国银行家对美元的信心的一种手段；他已经对黄金外流感到忧虑，这个问题在1960年晚些时候终于爆发了出来。